

中原时评

■个论

阿里腾讯同入民营银行试点的玄机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说,目前已确定5个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分别由参与设计试点方案的阿里巴巴、万向、腾讯、百业源、均瑶、复星、商汇、华北、正泰、华峰等民营资本参与试点工作。(本报AA05版)

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上看,互联网金融无论是第三方结算支付系统,还是贷款资源的配置效率,都远远高于传统银行。比如:阿里小贷公司通过对其淘宝、支付宝和天猫线上的客户信息源大数据进行很短时间的挖掘、运算和分析,就可得知其业务经营资金是否短缺,是否需要融资,并可清楚分析出其经营整体状况是否存在风险,在此基础上24小时内就可以将贷款发放到客户账户之中。无论是风险识别和评估,还是发放贷款的时效等都是传统银行远远难以做到的。再比如,阿里巴巴、腾讯依靠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的金融支付功能,以及理财产品营销等,其便利性、时效性完全不受时间、地域、空间和传统银行物理性网点的限制,这也是传统银行无法做到的。银监会是在鼓励在中国乃至世界最先进最新潮的互联网新经济新金融的发展。

银监会批准阿里巴巴和腾讯双双进入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笔者分析背后凸

显监管部门的超强智慧和玄机。首先,以阿里和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目前风起云涌,发展速度之快超乎包括监管层在内的所有部门和人士的意料,特别是近期关于余额宝、微信理财通等宝宝们们的争议非常之多,因此,对其超大规模带来的金融风险担忧越来越多。呼吁对其监管的声音多而且分歧异常之大。这时候将阿里和腾讯纳入到首批民营银行试点之中,这互联网金融两大巨头将被监管部门彻底收编,其旗下的小贷公司、余额宝、支付宝、微信支付以及微信理财通等都将整合到新成立的网络银行整体业务之中。要么成为网络银行的信贷等资产业务,要么成为银行支付结算系统,要么成为银行中间业务。无论成为什么,都将按照监管部门的所有监管政策制度标准接受监管。来自监管层的约束是全面性、整体性的,这对于民众担忧的风险将会大大降低,对于互联网金融要不要监管的争议将彻底画上句号。这是监管部门的高明之处。

其次,批准阿里、腾讯两家同时进入5家试点民营银行行列,无形中形成了3层竞争格局:民营银行包括网络银行与传统银行的竞争,网络银行与传统银行模式的竞争,网络银行之间的竞争。试想,如果阿里一家网络银行

进入到民营银行试点之中,凭借马云的智慧,极有可能依靠其大数据、庞大的客户基础以及移动互联网优势很快形成在这一领域的自然垄断局面。但是,阿里、腾讯同时进入试点民营银行,两家可以展开一如既往的竞争,其结果是,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越竞争消费者受惠越多,市场活力越大越持久,并且可以防止可能出现的自然垄断格局。这也许是银监会等监管部门设计出的美妙绝伦的玄机。

阿里、腾讯共入民营银行给传统银行和传统监管方式都带来了挑战。对传统银行的挑战大家都已经有目共睹,一个余额宝已经令传统银行惶惶不可终日。马云曾经豪言要“改变银行”。现在真正到了革传统银行命的时候了。传统银行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对监管部门也提出了挑战。网络银行与传统银行在金融管理方式上确有很大的不同。就比如前面提到的贷款资产拓展方式,现有的《贷款通则》和监管部门的贷款管理制度以及传统银行对贷款客户的考察方式和程序制度都显得过时了,都不能套用了。监管部门急需按照网络银行业务运行的特点设计出新的、适应互联网新金融的监管制度和模式,这是最为急迫的事情。□余丰慧

■街谈

“来自杭州的电话”有何深意?

3月10日,家住宁波市的童先生给某报新闻热线87777777打来电话:“妻子在黄山旅游时不慎丢失的手机,被一名游客奇迹般地积雪中捡到了,对方在确认地址后,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把手机寄过来。他还说,捡到手机的那一刻,唯一能想到的是手机里的资料对失主肯定很重要。这个陌生电话,让我感到很温暖。”(3月11日《宁波晚报》)

捡到手机,给失主打一个电话,看似普通的举动,却孕育着人心中的温暖。你能不能做到,我能不能做到?当我们面对杭州人的善举时,内心中的盘问也随之而起。是的,原本这样一个举动,最平凡不过。可正因平凡,所以又更显温暖。时常关注时事的人,不会忘记,不久前,深圳一位女白领在地铁口晕倒,却没有人及时把她扶起来,做一做紧急救护。可能,我们都觉得,类似这些事情,没有我们去做,也会有别的人去做。但许多时候也正因为这样的责任分散,而使得无人愿意出手。

纾解这种现象,应追寻道德的作用。随着社会转型,很多人陷入价值观的迷茫,导致道德滑坡。在进入市场经济后,又有不少人对市场经济心存误解,认为市场不需要道德。还有一些人,将法律与道德对立起来,在强调法律的作用时,忽视了道德对社会和谐的调剂作用……但实际上,建设一个好社会,离不开道德,确立市场经济也不能排除道德的作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写完了《国富论》一书后,又赶紧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以提示人们千万不要忽略道德。因为道德的

作用就在于为法律底线铸就一道防火墙,使我们的发展不至于濒临底线崩溃的边缘。

知名评论家熊培云说过,这个时代流行的并不是抢占道德高地,而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大家一起审判崇高。这种抢占的反叛,标志着道德的解构。而在某些时候,盲从极容易感染我们。犹如鲁迅说过的“同去,同去”,在分不清方向的时候,裹挟大多数一起宣判道德。而当越来越多的人预言道德已死时,这种示范效应便犹如那个邪恶的俄狄浦斯情结而自我实现。因而,抵御一个社会的坏风气,需要一些最简单最真挚的行动。比如,捡到手机给失主打一个电话等,它都能点燃一个人心中的温暖,虽然微不足道,但积少成多,可以融化一片冰冷的人心。

“来自杭州的电话”本是一则再普通不过的消息,它引起我们的关注,正因为它之于重建道德的意义。当然,重构道德是一件大事,光靠一个“杭州的电话”肯定不能完成。但这些微小事情的出现,说明人心之中有重构道德的土壤,有向上而行的力量。只需我们认真练习,重新接纳道德作为社会的一种规范,在制度上构建去恶向善的机制,融化城市化带给我们的陌生人效应,建设更好的社会,便也就有了可能。

面对当代中国的复杂转型期,熊培云问,“这个社会会好吗”,而我却问,“我们的人心会好吗”,“来自杭州的电话”恰做了最好的解答。在大时代,守护好自己的心灵,社会便有了向上的力量。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个论

公车堵路,可堪玩味的前因后果

黑色别克车横在医院门口,司机不见去向,疾驰而来的两辆救护车无法进入医院,警报长鸣。3月10日上午,这一幕发生在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院门口,别克车拦住“生命通道”10多分钟。在场群众将车团团围住,义愤填膺。记者调查得知,别克车是黄山市烟草专卖局徽州分局公车。该单位一位胡姓负责人表示,驾驶员姓单,是该单位的正式员工。(3月11日《京华时报》)

生死攸关之际,却遭“公车”堵塞拦路。始作俑者单某,虽非故意刁难,但其出格行为险些酿成大祸,故而仍难免招致一片口诛笔伐。围观者怨怒所指,一则因其缺乏公德,再者则关乎因公谋私——两项控诉交织一起,单某俨然变得不可饶恕!于此,当然有人存有不同见解,那位负责人就表示“说公车私用太上纲上线,单某开公车干公顺路看病而已”……

该怎样定性单某的用车行为?不同身份的人,有着迥异的见解。那么,到底是公众太苛责,抑或是“局领

导”太宽容?这显然是一个问题!按理说,谁也没有主观断言“公车私用”与否的权利:既然早有一套缜密成熟的标准在那,各方只要一一比照、据实评判也便是了。而由此出发,“开公车看牙医”实在是再典型不过的“私用”,根本与是不是“顺路为之”无关。

面对单某的行为,所属单位领导的暧昧态度,着实可堪玩味。其极力淡化事态,不遗余力为单某辩护,或许是基于一种为自己人护短的偏颇心态,又或许是担心一旦“公车私用”坐实自身会承担连带责任……但无论如何,总归给人一种回避重点、罔顾事实之感。一再曝出、屡禁不绝的公车私用新闻,很大程度上就与体制内的此种纵容氛围有关。

只要愿意,一切公车私用行为,都可以找到一个情有可原的“借口”。若不是单某在外闹出了祸端,其“私用公车”行为,根本不会引人注目、招来“批评教育”吧。当然,我们不愿意揣测,其公职身份,与堵住“生命通道”的

放肆作为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只是有必要提醒,不论是谁、在何种境况下,都应遵守起码的公共规则、怀有起码的公共精神。

“不损人利己、不施害于人”,乃是一切公共规则的核心诉求。给应急车辆让路、不占用紧急通道等行车规则,恰是为了确保在特殊情况下,次要需求能让位于燃眉之急。任何人,都应接受并遵守这一系列的价值规范。事实上,这也是个体社会化的一部分。唯其如此,我们才可更好地融入日常社会,融入那种运作有效的社会秩序。

单某因一时赌气,停车堵住“生命通道”,定然没想到会引发后续事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缺乏为潜在不时之需而让渡一时便利的自觉,而总是侥幸地相信“不会有事”。久而久之,那些经年累月积攒的“生活经验”,早已架空了人们对于例外情况的预判与预防,直至危机突如其来,也就只能悔之晚矣。

□然玉

■街谈

失信黑名单与“稻草人”困境

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恶意逃避执行一直是法院“执行难”的重要原因。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说,去年人民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实行公开曝光,对7.2万名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了信用惩戒,约20%的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义务。(3月11日《人民日报》)

规则意识的淡漠、制度敬畏的缺失,必然导致投机心理的滋长;在利益的驱动下,“老赖”当真是走多远都不算远。“躲猫猫”也好,“老鹰抓小鸡”也罢,在“老赖”眼中,道德意义上的诚信和法律意义上的契约,都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规范,缺乏强烈的、持久的、普遍的行为感召力,成为虚化、悬置的“稻草人”,只能起到威慑作用,没有足够的约束力,最终形同虚设,在执行中大打折扣。

在日常生活中,对规范的知晓并不等于对规范的实施,规范既可能被执行,也可能被违反和破坏。“老赖”违反规范就会受到惩罚并被认定为失范者,这样的后果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也可能没有被抓住、没有被问责。只有操作系统越强大,规范才能实施得越彻底,规范发挥的功能就越强大,“老赖”才可能遵守规范,才会主动履行义务。

“老赖”之所以有恃无恐,就在于充分利用陌生人社会的匿名属性。美

国社会学家沃斯认为,人口数量大、密度高、社会异质性强、流动频繁,导致匿名匿姓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这虽然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却给社会信用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在熟人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道德警察”,口碑就是不成文字的信用记录;而在陌生人社会,信用管理的缺失,让“不赖白不赖”的失范行为得以遁形和隐身。

如何治理“老赖”,见证着公共管理的智慧和水平。在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全面建立的背景下,提高失信行为的违规成本,让失信者为自己的过错承担应有的代价,是一个现实可行的路径。从这个角度上说,失信黑名单走出了“稻草人”困境,给“老赖”戴上了“紧箍咒”。

再厚颜无耻的“老赖”,也会害怕公开的社会惩罚——失信黑名单的信息会推送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工商管理等部门和征信机构,并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一旦失信行为和切身利益挂钩,“老赖”也会进行孰轻孰重的比较和权衡,从而做出理性选择。这一切,正是失信黑名单的制度善意所在。

由此观之,社会规范仅仅在道德上有价值还不够,还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失信黑名单打中了“老赖”的七寸,有助于倒逼诚信和催生社会文明,实现了道德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有机结合。□杨朝清